

元宇宙翻译范式:跨文化传播的可能世界

刘军平

摘要: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活动正面临着新的范式变革。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元宇宙视野下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新理念内涵极具意义和价值。通过梳理元宇宙早期人类文化哲学的经典叙事和建构,援引孔德的三段论观点,可揭示元宇宙视野下的历史文化形态及虚拟现实的时空意义。从认识论角度探究语言哲学作为构建元宇宙的形而上知识,进而提出意义的可迁移性作为跨文化翻译的基石,凸显其与跨文化翻译的关联性。研究表明,元宇宙技术包括人文数字、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在跨文化翻译与传播领域将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与此同时,元宇宙带来的智能伦理因素需要反思。

关键词:元宇宙翻译;范式;跨文化传播;知识论;可迁移性

中图分类号: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1-0016-14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YY118)

随着新一轮数字革命突飞猛进,学科研究范式的演进势必成为一种必然。传统的翻译通过静态的纸质媒介转换、存储和传播延续千年学统和道统,但在以元宇宙为主的虚拟现实、数字人文、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冲击下,跨文化翻译正经历新的临界点。汇聚交叉学科的跨文化翻译,在其翻译理念、传播方式、传播内涵、传播对象和传播平台方面,以及在纸质文献存储与转换、译介传播、融合媒体翻译等领域,正面临新的知识增长点,也面临思维方式更新和研究范式变革的新挑战。在“后疫情时代”,以元宇宙为技术的信息革命正加速发展,翻译与传播领域正在更新知识观念,以构建数字信息时代的新理念,熔铸当下学科范式与话语实践,凝练译介传播的话语模式,拓展交叉融合的知识高原,以面向元宇宙视域下的全球传播生态。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再一次印证了其洞见和预测性。“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同其媒介观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强调和突出媒介本身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1]元宇宙作为一种媒介的延伸,作为一种信息,一种传播方式,显然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空间和思维空间。“媒介是一种科技,一种形式,它本身便是信息。”^[1]那么,元宇宙翻译范式是怎样从翻译的常规科学,发生学科危机和范式转变,进而呈现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呢?元宇宙翻译范式将会带来哪些新的内涵与应用途径?

新时期的跨文化翻译领域应重视“元宇宙现象”,抓住元宇宙新技术的奇点,探索译介理论和传播领域的新范式,锚定新的研究重点,推动译介传播理论建设的发展,促进数字人文、人工智能与学科的融合,以新范式来驱动学科范式的发展,助力打造对外传播体系下,数字人文知识创新的新谱系,以实现元宇宙时代的翻译学科范式的转型。

一、从宇宙到元宇宙:前元宇宙的经典叙事建构

何为“元宇宙”?何为“元”?古希腊语“元”(Meta)在辞源学上包含“在之后”“超越”和“总体认识”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最基本意义是“在物理学之后”。汉译“形而

上学”格义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意指那些有形物体之上的思辨学问,或指研究宇宙根本问题的学问。^[2]因此,从广义上看,“元宇宙”(Metaverse)是指链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虚拟空间,或者二者交互形成的空间。其基本概念内涵体现了经典叙述所涉及的叙事性、虚拟性和超越性等诸多特征。

元宇宙虽然是全新的概念,但就人类知识演进来看,可分为元宇宙出现之前的前元宇宙阶段和元宇宙阶段,每个阶段有其独特的发展特征。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思想发展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所有的认识都要依次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神学阶段,或曰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曰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曰实证阶段。^[3]在神学阶段,人把万物的变化都归因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抽象概念和实体代替了超自然的力量;在实证阶段,人们不再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取而代之以实验观察和理性思考。孔德“历史三阶段”论述映射了元宇宙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从远古的宇宙世界到当今元宇宙的演进,有着启迪作用。

(一)前元宇宙时期的经典符号叙事建构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4]。前元宇宙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由意义编织而成的网络。在前元宇宙时代,人类通过神话、史诗和文化哲学思考,来编织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联结之网。早期人类文化知识的疆域伴随着人类哲学上对“天问”的拷问,也伴随着人类超凡想象力的拓展,其世界观和宇宙构图因而发生变化。与其说元宇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经典概念的重生与重新阐释。在早期元宇宙叙事形态中,元叙事知识结构和体系以宏大叙事为主,方法上讲究主题性和目的性,而后现代则强调非连贯性和去中心化。显而易见,古人通过元叙事手段,来建构宇宙观和世界观,拉近过去与现在、虚拟与现实的时空距离。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四大文明不乏对宇宙起源的追问。“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汉书·艺文志》)这是中国哲人最早对宇宙时空观的界定,即广大无垠的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

由上观之,在前元宇宙时期,先民们试图解释自然符号和宇宙意义,建构一个链接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理念空间。从盘古氏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符号记叙了宇宙起源,到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与逢蒙、仓颉造字等创世英雄的神话故事,到民神杂糅的“三皇五帝”,华夏文化的诞生和成长,伴随着由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的假想延伸。上古时代人类的认知和经验都具有神话和巫术传统,早期社会巫觋能够用直觉和形象的思维,解释天文气象、自然万物的规律和社会秩序,具有“绝地天通”超凡能力,因而成为意义世界的通灵者。“无文字时专凭记忆,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5]进而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形成的《周易》,推演出阴阳、刚柔、天地的生生不息的辩证宇宙观。中国哲人的宇宙生成论突出的阴阳矛盾对立,把宇宙、自然、社会、人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鬲则九重,孰营度之?”(《楚辞·天问》)以屈原为代表的华夏“天问”,充满了超卓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探索精神。^[6]传说中昆仑山顶的“黄帝之园”名曰“玄圃”。《尔雅·释言》说:“玄,天也。”那么,脸书改名为Meta,其汉语对应的译名应是“玄圃”或“天庭”。在西方,Cosmos一词的希腊语“宇宙”含义,乃是从混沌中创生出的秩序。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康德的天体系统,到现代宇宙大爆炸所描述的宇宙学模型,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空间边界在不断更新拓展。“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但万事万物殊途同归,异名同出。不同符号的能指由纽带连接,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本质相同的意义所指。显而易见,“元宇宙”分有了“玄圃”相似的概念,同理,《易传》的阴阳五行的缜密思想与宇宙大爆炸的假说,无不存在契合之处。早期先民通过宇宙建构,进一步确认天人关系与物我关系,由物我关系创立符号表意,以呈现抽象图式和传播符号。《庄子·庚桑楚》所说的“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剝者,宙也”就是这种哲学意义上的超经验的“宇宙”观。“在传统文化和元宇宙文化相互渗透融

合中,人类文明或将被重新塑造。”^[7]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革命,从信息革命到数字革命,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知识领域正在发生着代际传播变化,其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在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从早期宇宙构想到元宇宙,其演变到底给现代世界观念带来什么?作为一个正在孕育中的范式思维,其基本构成形态是什么?具有何基本传播特征?

如上所述,不同文明的起源,无一例外地都充满了对世界起源的神话想象、哲学思考和文学叙事。如果说佛门三千世界创造了真如境界,其非实非虚,非真非妄,非有非无的特质可与元宇宙相比肩。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无疑构成了元宇宙的世界图景。“当人类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人文思想、技术工具、经济模式和‘宇宙’认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被赋予特定理念的‘宇宙’就成了元宇宙。”^[8]三维元宇宙通过现代影像工具将现实世界变得更虚拟,而3D元宇宙通过算力工具让虚拟世界变得更加现实逼真。二者皆非实非虚。

(二)元宇宙发展阶段及传播形态

元宇宙指向的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存的世界,它既具体,又抽象,既现实,又虚拟。元宇宙一词源自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1992)。他提及在虚拟的共享空间创造新文明的想法,其中的关键概念是“元宇宙”和“化身”(Avatar)。“关于‘元宇宙’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是映射现实世界的在线虚拟世界,是越来越真实的数字虚拟世界。”^[8]可以看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基于未来互联网的共享特征的虚拟空间,是其主要构成要素。在虚拟现实世界里,人们用数字化身来控制或实现自身目的,或通过脑机接口进入,并获得感官体验的虚拟世界。质言之,所谓“元宇宙”既涵摄了形以上之“道”,也指向形以下之“器”,即统摄了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具体应用场景。作为一种世界观,元宇宙提供了一整套理解世界的观念,同时它整合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并赋能其中。

回顾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划分成四个历史阶段,一是口语传播时代,二是文字传播时代,三是印刷传播时代,四是电子传播时代。”^[1]结合人类早期传播历史及文化原型理论,以及当下对元宇宙的阐释,笔者将其大致整合为如下四种基本历史文化传播模态:

(1)以宗教、神话和哲学为载体的古典乌托邦形态,即是元宇宙原型传播形态。宗教信仰和文化是一种对现实的虚幻反映,如《圣经》中的创世纪和佛教创立的无量无数的大千世界。人类语言记载的最古老的梵文经典文献《吠陀》中的《梨俱吠陀》歌颂的神灵,在一个物体终结后,借助新的物体在另一个世界里“转生”。在轴心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描绘的是人类最早的乌托邦,即文化元宇宙。相对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原型,中土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和以《周易》为基础,构建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古典宇宙观原型建构模式,而《礼记·礼运》则描绘了儒家最高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的原型。

(2)以文学艺术为媒介、以富有想象力的、表现力的描述来虚构文学“元宇宙”世界。从苏美尔人古老的史诗《吉尔美加什》到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从盎格鲁—撒克逊最古老的史诗《贝奥武甫》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从但丁的《神曲》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从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记》到《爱丽丝漫游仙境》,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詹姆斯·希尔顿创作的《消失的地平线》描绘的世人所向往的香格里拉,从J. K. 罗琳的《哈利·波特》创造的魔法世界,到庞德翻译的《神州集》所建构的“想象的异邦”,人类文学艺术以超凡的想象力,笔补造化天无力的创造力,描绘了一个又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字传播世界。这类超越时空的文学形象,把真实世界扩展到遥不可及的虚拟境界,同时把远古人物拉回到现实世界,缔造一个时空交错的元宇宙原型。

(3)以科幻和“非中心化”游戏为载体,构建的新古典元宇宙网络传播。从凡尔纳的《海底两万

里》的科学幻想曲,到早期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的时间旅行,从霍金的科普作品《乔治的宇宙》把人类带入探索神秘宇宙的奇幻之旅,再到刘慈欣的经典作品《三体》,科幻作品极大地伸展了人们的想象力,拓宽了人类对“元宇宙”的知识视野。千禧之交,《黑客帝国》风靡一时,它展现了人工智能系统所控制下的机器与人类的终极命运。虚拟现实建模语言建构的赛博朋克城市进一步体现了动态交互的特征。2003年菲利普·罗斯代尔推出了游戏版虚拟世界“第二人生”,将真实社交场景映射到网络等,皆是元宇宙发展史上标志性节点。

(4)2021年标志着元宇宙发展史的元年和传播理念的新世界。扎克伯克宣布将“脸书”改名为Meta,力图打造一个未来的社交平台,以实现建立一个虚拟数字新世界的愿景,至此掀开了未来互联网的终极篇章。

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元宇宙概念从早期的乌托邦阶段到反乌托邦阶段,或从亦真亦幻的神话虚构,逐步过渡到新技术、新媒介传播的新模式,即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打造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和数字生活空间。乔·拉多夫将元宇宙的构造分为七个层面:体验、发现、创作者经济、计算空间、去中心化、人机互动、基础设施。^[8]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语言和文化传播者不断地穿梭于现实和虚拟空间,通过语言符号和视听技术,感受到亦真亦幻的话语转换、交互交往和具身传播。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元宇宙”虚拟世界中,译介传播者可通过调整和建构自己的新身份来实现,从而彰显新的传播形态的可能性。那么,元宇宙翻译范式的哪些维度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呢?

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语言中介和介质,不仅仅关注“元宇宙现象”作为一次技术赋能,而且应该研究这次库恩科学革命范式带来的转变。元宇宙翻译范式所聚焦的要点包括:编码和译码机制、媒介环境与具身互动,语言的可迁移性、技术伦理问题等核心命题。通过上述命题,我们可以探索新的传播方式,提升译介和传播效果。毋庸置疑,元宇宙翻译范式带来的变革将是,一种全新的传播观念的变革。

二、元宇宙翻译:隐喻、可迁移性与网络行动者理论

如同“元宇宙”与“元哲学”和“元伦理学”一样,“元翻译”视野下的研究不关注一种具体的翻译理论或技巧,聚焦翻译研究的形而上的思考,即关注翻译研究结果和过程的再研究。元翻译研究属于一种语言哲学和传播学理论的延伸,凸显的是对翻译本质问题做形而上的探究。当下的元翻译研究既可以运用一种新的语言来反思学科的概念和命题,也可探究更新或完善现存的知识结构。

元宇宙翻译范式,既有元翻译的形而上的因素,也指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一个平行世界的语言来建构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语言行为。易言之,与常规的语言之间的转换方式不同,元宇宙中的机器翻译、具身性及其人文因素涉及面较为复杂。一种语言结构与另一种语言结构之间存在多模态关联性,语言转换与虚拟身份的转换,意义等值与否,皆依赖于特定媒介时空的语境与场景。译者在此多模态、开放性的世界里,可参与健动的、变动不居的语言创化活动,实现语言与传播的交换价值。元宇宙翻译范式所追寻的目的就是,在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去寻找本质不变的对等模式、传播途径和一般规律。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它既关注传统形而上的语言哲学问题,也重视建构译介传播的途径与新技术融合的维度。

(一)元宇宙译介:隐喻符号的转换与自我指涉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翻译模仿论的渊藪。从元宇宙视域看,翻译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隐喻,如影随形,相生相伴。这种隐喻性就是一种“隐含元宇宙范式”。“语言就其本性而言,在起源上就是隐喻的。”^[9]翻译与隐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二者的虚拟性和转换特点,皆是创造新图景的手段。从最早的有关翻译的界说或比附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翻译的隐喻性的空间建构。古

印度维护宇宙秩序之神祇毗湿奴作为一种“化身”,与翻译比喻为虚拟化身的意象异曲同工;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的两副面孔(Janus-faced)也是翻译的化身,它作为一体两面,指向的是过去和未来。

翻译与元宇宙皆是作为一种隐喻性的镜像存在,来构筑其时间和空间结构。《周礼·义疏》的“译即译,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阐明了翻译作为变色龙的镜像本质。^[10]无论是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论”,无论是“投胎转世”,还是“左右难为巫”,译者像巫觋一样,始终穿梭于凡间和神界之间,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寻找信息传递的确定性,建构另一个新世界的符号语义场。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提出的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和“道”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翻译的创生之道殊途同归。虽然变幻万千,翻译之道与自然之道、人文之道、技术之道一样,其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译道的最高理想,推而言之,就是从作者到译者到读者,三者之间通过译者进行时空链接,三者相互依存,互为主体,建立一种和谐自然的平衡——元宇宙翻译生态圈。

巴恩斯通将翻译喻为“弃儿”,总是在为自身寻觅新的现实和想象的家园。“翻译是语言的艺术。艺术之子永远地穿梭于故土与异域之间。一旦穿越边境,弃儿要记得换上新装,隐藏故国身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11]翻译作为变色龙、影子或替身等形象,如果在虚拟世界,不就是元宇宙的“虚拟人”么?虽然在信息数字时代,翻译变为不同文字语言或符号,或通过人脑思维或人工智能进行等价交换行为,但不变的是翻译变易的本质,以及作为传播符号的价值。

实际上,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活动,就是用一个微观元宇宙世界的符号,替代另一个微观元宇宙世界的符号。由于人的认知语言结构是认知官能和认知过程的产物,它反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理解或信念而形成的概念结构,符号的运用使语言和心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人脑认知通过观察获得信息,当信息与传播的结果与认知模型一致,则产生等值翻译。“认知中的隐喻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12]心理再现和符号转换过程探究的是,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储存、抽象提取,怎样通过认知进行加工,怎样运用符号和概念范畴来实现表征再现、实现翻译的再交际和传播功能,以构建一个相似的平行世界。尤其是当人脑的认知与原语的符号对象产生偏差,意义补偿系统则进行矫正,认知意义的可迁移性是元宇宙理论的根本理据。翻译是用一套符号系统,无论是虚拟指涉还是现实指涉符号,来再现另一套符号系统。同理,元宇宙所映射的是语言意义的可迁移性和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性。

(二)元宇宙:意义的可迁移性作为翻译的基石

如果宇宙对应于物质世界,元宇宙则可理解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符号化、对象化、精神化或理念化。元宇宙语言转换指涉的是用语言构建虚拟的真实世界。作为一种传播模式,元宇宙翻译范式凸显的是,用语言或视觉形象构筑起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元宇宙与译介的相似之处在于,意义的可迁移性和运用语言可转换性重构二元世界。

物质的真实世界和虚拟的精神世界到底何为本根?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可见的现实世界是抽象的“理念世界”的摹本或影子。物质世界不断变换,理念世界永恒不灭,认识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的精神世界中,译作只不过是对原作的模仿,翻译作为一种模仿的结果,而原作只不过是分有了“作品”这个理念,因此翻译是对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阐明的概念范畴观界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通过亚氏的范畴理论,我们能够有序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认知的探索。亚里士多德的再现论说明人是通过感觉、知觉、概念、推理、判断等范畴来体验世界范畴,建立与世界的关联。翻译的符合论的基础正是来自哲学的主客观符合论。换一个角度看,符合论及意义的可迁移性,很早就为元宇宙的可能世界确立了信息技术的理论框架。

从哲学思维来看,元宇宙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涉及人的认知、信息转换、模型建构及伦理学等问题

的方方面面。跨文化翻译也从多个维度受益于语言认知和意义转换等语言哲学议题。语言哲学按照自身逻辑构建了认知、概念、指称、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概念和对象、意义和指称、意谓和意旨、内涵和外延以及言语行为理论等,皆为构建跨文化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莱布尼茨是较早从哲学角度提出“可能世界”概念的人。“可能世界这个概念取决于事物可能的存在方式这个概念。事物可能会不同于他们实际存在方式,而这些可供选择的存在方式中每一种存在方式便构成一个可能世界。”^[13]他认为,只有事物的情形或其组合推不出逻辑矛盾,该事物的组合就构成可能世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构造了一个心理学的精神世界。其所描绘的单子是一个封闭的自为世界,每一个单子像镜子一样按照其自身的观点反映着世界,它对格式塔理论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产生了较大影响。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尤其是二进制对现代计算机技术影响甚大。二进制的二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指涉了物质与精神的现实与虚拟世界。元宇宙构成的是一个自洽的虚拟世界,而翻译也塑造的是一个虚拟语言国度。无论是赫尔德提出的语言塑造民族精神,还是洪堡特提出的世界语言图景理论,都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决定论之所以能一时大行其道,在于其提倡者认为,话语或翻译能构建民族认同,或塑造成一种新的世界观。跨文化翻译即是在创造新的话语世界和世界观,它既要注意不同民族语言的特殊性,也要兼顾语言表述的普适性。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比喻为一个大的元宇宙,则有单个小的民族语言的元宇宙。普适性与特殊性话语转换的结果则构成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异化与归化、隐性功能与显性功能等基本语言问题。进而言之,跨文化翻译的语言图式分享了语言交换的等值共性。

从这一点看,语言哲学的语言图式概念不仅为元宇宙,而且为跨文化翻译与传播中的关键概念范畴的转换打下了理论基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强调游戏规则即语言的使用,语言的用法是动态的,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用意义。其突出“情境性”的观点既可以作为元宇宙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说是语用翻译观的本质观点,也为认知翻译观中的解释性相似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维氏早期主张将逻辑、语言和世界连接起来,寻找共同的本质,到后期“家族相似”,我们仿佛看到了奈达文化翻译理论的从形式对等到功能对等的转变。大卫·戴维森在“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中强调概念系统内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抽象联系,不同语言的概念系统及其结构会影响个体理解方式并形成宇宙图景。普遍性以世界的普遍性和体验世界的普遍性二种形式存在。体验的差异性决定了理解的多义性,理解的多义性决定了对所产生对象(文本)存在多种意义。“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二种语言分享了同一种概念图式。”^[14]从传播理论从发,人们对语言语义的理解并不取决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取决于人们对该词意义的理解,符号的实质意义在于人赋予它的意义。元宇宙和语言转换之所以有共同之处,正是因为使用者分享了赋予其中的概念图式和情境意义。

质言之,从人际传播理念来看,概念图式不同,语言也就不同,而翻译就是链接概念图式和不同语言的中介,这样说不同语言的人就可能享有相同的概念图式。同理,这种概念图式观如同元宇宙的基本构架和规则一样,只要人们遵守了数字化复制法则和其中的游戏规则,就可链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元宇宙的情境性也意味着特殊性,亦即翻译的不确定性。易言之,引起跨文化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为跨文化传播中的译者的认知活动涉及对复杂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概念化的重构方式等,也涉及个人对特定世界的认知和语言能力的掌握,且由于物质世界刺激信号产生的反应不同,所处的身外世界和脑海图景等媒介环境异同。行为主义者如奎因的“极端翻译”认为,翻译就是要编制一部从原语到目的语词条一一对应的语言手册,但由于外部行为倾向并不能完全确定意义和指称,因此产生了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作为不同的语言文化碰撞的结果,形成了不同的异质语言文化模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或微观元宇宙。在瓦尔特·本雅明眼里,翻译是原文文本的“再生”,赋予原文以延续的生命。翻译既有自己的独立性,又与原作密切相联系。本雅明关切的是“纯语言”

的相互关系和先验的本体,其弥赛亚救赎主义理想在于将翻译看作一种“纯语言”的存在,恢复已坍塌的巴别塔,用再生的“纯语言”去建构犹太人的卡巴拉世界。这显然是一种语言超越论的体现。它形成了翻译的悖论,一方面跨文化翻译需要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它传递的更是一种意旨方式。同时,作为一种隐喻,翻译的隐身、现身,与元宇宙的具身和半具身、通证和虚拟形象形成了共鸣。翻译的目的是拆除藩篱,消除自我中心,跨越边界,塑造混杂认同,而元宇宙终极目的则是需要建构一个共享的、去中心化、多元的虚拟语言空间。在“机械复制”和“灵韵消散”时代式微之后,元宇宙视野下的“后机械复制”的数字化装置则可变易身份,跨界体验和沉浸其中的虚实。

元宇宙的哲学存在论既是一种“此在”,又是一种“与他人共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试图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从“此在”(Dasein)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把时间看成是“此在”存在的境域。世界不是一种现成的空间场所,而是“此在”在世界中的时间性展开活动。主体和语言不是主客宰制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是一种与“世界共在”。引申而言,元宇宙的“此在”概念既体现了传播者沉浸时间的延绵性和即时性,就具身性而言,又展现了其空间的在场和不在场。就语言本体论而言,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语言是存在之家”或“语言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是话语或言谈。”^[15]同理,作为传播者的译者,理解文本不再是找出文本中的内在意义,而是在超越“去蔽”中敞开揭示出文本所表征的存在可能性。作为存在者的传播者或译者,其与文本、读者、世界及存在建立关联,超越主体的“此在”的言说和存在方式。通过翻译这个媒介,一方面,海德格尔企图回到古希腊思想源头,回到“大音希声”的初始状态,另一方面,海氏颠覆了人们对翻译观念的固有成见。通过对“涌现”“解蔽”“逻各斯”等基本希腊词汇的翻译和分析,海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存在思想体系,抵达澄明的、物我交融的时空世界。在元宇宙中,语言作为思维的代码,替代了原主人发声,虚拟人在不同的游牧部落中迁移意义,传递真实或虚假信息,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网络话语世界。

(三)元宇宙:翻译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不难发现,元宇宙的形而上的理念与跨文化翻译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诸多后现代知识理论不仅构成了元宇宙的根源性的本体问题,而且给跨文化翻译研究带来无限的启迪空间,为二者的理论思考提供了活水源头。

涉及凸显群体共识和特殊异质文化进入空间的价值特征,福柯的“异质空间”所强调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空间存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文化生产”和“文化资本”等,揭示了文化生产、信息传播和接受以及翻译现象与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和本质,将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结合,突出了场域空间位置之间的主客观关系是一种网络构型。社会学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一种实践建构取代社会理论建构,发展了“translation”作为一种失真的“转译”概念,从信息论的角度强调“转译”是一种经过调节的交流形式。其中的“拟客体”(quasi-object)更是消除了主客二分,用“人类世”概念(Anthropocene)凸显人与非人的关联。传播者、译者、虚拟人通过“转译”的调节和交往,体现了其社会交往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拉氏提出的“联结社会学”和“转译社会学”理论为元宇宙的社会交往话语的制订提供了规范参照。与此同时,虚拟人的出现又为破除人类中心或译者中心的“我执”,建构了一种新的混杂身份和时空关系,形成了传播者作为一种异质要素构成的行动网络。

跨文化翻译中的译者或传播者作为行动者,通过交往的具身性和情境性参与其中,在网络世界能够相互赋能,重组虚拟现实社会,实现共生共荣。社会学家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提出的后现代民族认同建构的观点,给元宇宙虚拟身份建构提供了启迪。毫无疑问,元宇宙的世界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传播者或译者的身份建构,依赖自我与他者技术的互相重构。鲍德里亚的仿像与模拟理论仿佛天才地预见元宇宙场景下的翻译场景,在模拟原则中一切现实皆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模拟(翻译是一种模拟)不再是某种指涉物或本质的模拟,它摆脱了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对应

应原则,进入一种超现实的、超地域的、程序化的建构世界。鲍氏的理念仿佛为元宇宙理念量身定制:由于现实被融入表面化的表征之中,逼真生动的不真实与真实的界限被打破,模仿的意义世界似乎比现实更真实。元宇宙的沉浸性和具身性时常让人不辨真我,进入超现实境界。德鲁兹和伽塔利在《千层高原》提出的“块茎理论”,作为一种罢黜“知识之树”的等级系统,颠覆了知识体系的二元思维,突出“去中心化”和“游牧”思想。“块茎”的无等级、分散型特征,突出“联系性和异质性原则”以及“多元性原则”,恰如其分地映射出元宇宙中的“部落化”特征。在实际应用中,“块茎理论”解构了传统的传播者中心或译者中心,突出作为行动者的网络联结,为传播生态圈的“众声喧哗”打下了科学实践的基础。在翻译实践中,区块链技术和网络众筹翻译似乎印证了这一高光时刻的到来。的确,后现代诸多理论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元宇宙”的传播场景包括翻译场景提供了一套理解网络和树状的逻辑世界,它极大地赋能跨文化中的译者参与、建构、整合、改造网络世界的的能力。

元宇宙的精神世界究竟存在何处?在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划分里,物质世界为“世界1”,包括物质的对象和状态;精神世界为“世界2”,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3”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它包括客观知识和客观的艺术作品。翻译理论家切斯特曼认为,米姆居住在所有这三个世界中,书作为一种纸质材料居住在“世界1”,其理论观点贯穿“世界2”,其具体内容存在“世界3”。人的知识和思想是书本的灵魂和价值所在,没有它,纸张只是废纸。“世界3”是人们创造的结果,但一旦创造出来,它也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规律性。^[16]同理,在元宇宙世界里,翻译的“超级米姆”寄居在一种虚拟现实空间,其信息在不断地复制和传播。译者面对的不是外在于人的本然世界,而是把翻译作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世界。由此,译者通过参与精神世界的活动,进入到意识和概念的虚拟现实世界。

霍姆斯在其《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关于翻译学的构想不能不说不够缜密,但是其“元翻译学”的论说还是付之阙如。借助元宇宙理念,我们可以重新挖掘、梳理和建构跨文化翻译的基础理论,重视语言哲学中意义的指称意义、使用意义、语言行为意义以及可迁移意义等,厘清其基本概念和逻辑命题,反思元宇宙翻译范式的本质与现象,对译介传播中传统知识进行批判洗汰,探究信息技术下所构成的新的认知结构,强调现象虚而有实,本体真而亦幻等超越性思辨特征。借此,翻译及跨文化传播研究通过调整自身知识结构,补充增量新知识,推动自主知识创新朝纵深发展。

四、元宇宙应用:数字人文翻译的多模态场景

元宇宙虽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的虚拟家园,但是这种虚拟世界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乌托邦世界。“桃花源里可耕田”?诚然,元宇宙有其虚拟的一面,也有其现实应用价值。当数字孪生把空间映射到虚拟世界时,这一从空间链接到人的过程是由实向虚,而由人链接到空间的过程则是由虚入实。两个过程的虚实互动,形成了元宇宙的虚实一体化。推而言之,元宇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介入到跨文化翻译,将如何影响翻译研究的范式空间?作为一种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和时间的虚拟现实社会,它会孕育什么样的语言、文化、技术和社会生态环境?虚拟现实技术如何在翻译领域物尽其用的加以应用?

(一) 元宇宙给语言服务行业带来的冲击

近年来,语言服务行业正经历着时代剧变,人工智能、自动翻译、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翻译软件以及互联网翻译工具等无处不在,给翻译行业和翻译研究带来了划时代的数字化影响。“翻译正经历着一个革命性高潮阶段。数字技术及互联网对翻译产生着持续不断,范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17]这种变化即是从印刷思维到数字思维的转变,也是从印刷文本到数字文本之间变迁。因此,元宇宙带来的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上的技术变革,更是深化翻译与传播认识论上的探索。

毋庸讳言,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发生“数字转向”(Digital Turn)。在新技术背景下,跨文化翻译不

仅关切信息处理能力,更需要关注与技术要素的理解、互动、契合与优化。易言之,在数字技术背景下,尽管翻译领域关注的意义问题仍然是中心问题,但启蒙以来理性主义所高扬的人的主体性或译者主体性有可能被颠覆,人机互为主体将成为常态。从印刷文本的原文到译文,从数字文本的重新阐释到标注,从译本的翻译质量到接受效果,皆需要予以重新评估。进而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认知模式在数字技术影响下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它将重塑现有翻译理论和传播实践框架。

在元宇宙大视野下,数字文本的多模态样态和数字文本的翻译、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端将会呈现多极化形态。由于新媒体移动端的灵活性和文本呈现的生动性和即时性,新媒体翻译也将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翻译产业的语联网和物联网的跨界融合,在数字技术和数据中心支撑下,将形成新的产业场景。译者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者,将成为自由职业者和数字生产链者,即笔译译者上链,口译译者实现保真同步,并通过数字平台传播链迅速扩散,形成新的语言服务产业链甚至业态重组。在这一语境下,中国本土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在除了利用传统介质之外,还可利用短视频、游戏、网络等新的手段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平台。事实上,截至2021年底,抖音短视频国际版已超过谷歌成为全球浏览量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并且超过脸书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APP,抖音知识视频累计播放量超6.6万亿、评论量100亿、分享量83亿,从而进入全球社会媒体的顶流。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知识获取成为一种“普惠效应”。翻译和国际传播如能充分利用这类顶流平台及其中国在媒介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将进一步创新国际传播新模式,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笔者建议,应尽快加强对元宇宙的国际传播应用场景的设计与实施。翻译行业作为国际传播主体,应积极构建以“技术+内容+场景”为核心的行业生态系统,以实现三个“交互”,译者与国际社区的交互,译者与元宇宙技术交互,虚拟人与现实交互。国际传播通过引入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区块链、VR/AR技术,链接技术与翻译,构成学科新的知识域。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挖掘技术、可视化知识图谱、远程同传、虚拟实境模拟、超高频数字视频转播、关联网络及社会化网络等是支撑数字国际传播的核心技术。

就跨文化翻译领域本身而言,在应用场景上可利用VR设备进行历史翻译事件或历史文化人物的还原,将静态事件和人物动态化和形象化;将纸质资源转化为数字翻译资源,对信息文本进行规范化信息标注,建设大数据资源语言服务专题,使数据挖掘更加便捷,为翻译文本提供立体阅读或翻译场景,进行拟实呈现,提供网络翻译的众包及其网络翻译知识产权的保护技术,利用区块链进行翻译产权确权,利用交互技术和数据管理技术完善机器辅助翻译。在打造翻译话语方面,面对海量数据资源能够精确提取所需翻译文献,搜寻所需目的语话语译本。在语言服务方面,为特定客户提供全球即时定制翻译,赋予传播的直观性、可读性、可视化、即时性等方面的体验。毫无疑问,元宇宙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将会大大增强对沉浸式、交互式功能等技术的利用。人文学科包括翻译与国际传播将会成为“软件密集型人文学科”(Software Intensive Humanities)^[18]。

元宇宙技术有必要从多维度对接国际传播和翻译行业,使之朝着智能化迈进。就翻译服务而言,运用网络翻译工具进行语义搜索,在不同的地域实时进行文本编码和解码,通过虚拟技术为任意位置的移动终端提升翻译服务效率。在翻译效果而言,人工智能中的文本处理、语音识别、人机交互、深度学习及聚类分析等技术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自动翻译的质量。就多模态而言,根据不同的读者需求,元宇宙提供的翻译模式将呈现出图片、声音和视频数据资料的信息翻译转换的界面,以拓宽知识信息理解的宽度与广度。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元宇宙技术的提升,除了提供翻译文本之外,可以期待自动翻译将在非结构化语义识别和隐性知识深度挖掘方面会取得创新性突破。元宇宙的多维翻译模式将会在数字、结构和功能上改变传统的二维翻译模式。在数字网络化和智能化方面,实现翻译数字化共享,构建新一代开放型智慧翻译平台,进一步加深人文认知与科技认知的融合,从而使传统的翻译行业实现颠覆式革命。

(二) 数字人文技术: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突破点

显而易见,元宇宙技术及其知识范式将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应用领域,其影响将无远弗届。在未来的元宇宙场景,通过构建庞大的知识数据库,机器翻译或脑机接口,翻译和国际传播将具有超强的算力、迅速的反应能力和高效语言输出能力。在机器的认知赋能方面,基于语法、基于统计和基于翻译实例的翻译机器,通过脑机接口,使人机相互赋能,互为主体,人赋予机器翻译以审美体验和想象力,机器赋予人以强大的语言能力(记忆库和术语库)。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元宇宙世界里,二种记忆过程思维过程以及输入输出过程合二为一,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成为可能。元宇宙中的翻译场景使作为译者的传播者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情境界限,通过虚拟自我与他者,进入独特的镜像体验世界。新型传播者将进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物我两在、天人合一的真实与虚幻境界。在这一背景下,系统或网络在双向沟通中把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综合起来,唤起物我之间互参互补,互认互显。同时,传播过程也需要将信息技术注入人文因素和情感认知体验,同时技术拓展了话语知识生产的空间并为其赋能,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国际传播知识论系统。

换言之,翻译和跨文化传播,仍需要从传统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现代技术三大资源中获取新的知识增长点,既关注翻译、跨文化传播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也重视元宇宙技术和二者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将使各自学科在空间视野上更加开阔,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更加丰富多彩,学者在前沿动态方面也可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课题。在元宇宙视野下,有必要重塑传播学、翻译学作为人文学科新的元素,发现创新性学术研究范式,推动应用翻译场景的落地,探索跨文化传播和翻译学科的共性规律。可以预见,现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与传播和翻译话语的契合与整合,在文本可视化、数据库建设与利用,国际传播的数据分析与提取,对外话语的多模态与传播等技术的运用等领域,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元宇宙中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等技术,无疑为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工具路径,拓展新的知识论域维度,激发新的活力,赋予翻译和跨文化传播以新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跨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建构,必须巩固加深自身专业领域的知识,必须走跨学科的道路,迎接“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有必要夯实对外话语传播与数字人文的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数字人文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创新数字话语翻译模态;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知识将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认识论基础,为当前跨文化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赋予知识域以新概念和新内涵。事实上,虽然人文科学在精确性、实证性和可重复性方面要求并不严格,可自19世纪以来兰克提倡大历史观以来,实证分析方法就一直被应用于人文历史学科。尤其是在当今跨文化翻译实证研究中,线性描述事实变得日益边缘化,而可视化文献分析的采用,以及在将来三维技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将使翻译研究的可视化变为具体真实,可深入揭示传播话语的本质特点。如利用大数据对《礼记》译本进行新的定量阐释,利用数据清洗异常值、缺失值和重复值,提升数据运用效率,辅以实证数据,从微观和宏观上给予分析,从而得出更令人信服的客观结论;利用开发的数据库对《红楼梦》译本的双语词汇和频率进行比对,典籍中所出现的频率与转换特征可清晰呈现;出土简帛的古文今译及其电子化的技术的采用,也可让古老的史料焕发青春。技术的加持,使译介传播成为媒介传播的前沿动态。

(三) 旧的范式的终结者:元宇宙未来的翻译应用场景

显而易见,数字人文对跨文化翻译的渗透和影响日益彰显,不仅是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强势辐射所致,更是由于当今生产知识、获取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方式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库恩指出新范式的优先性在于,学术共同体成员感到,旧的常规范式面临新的科技发现而试图寻找新的范式。^[19]因此,元宇宙带给翻译知识结构的冲击也随之发生哥白尼式的变革。一方面是信息技术对于跨文化翻译的本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代跨文化翻译的研究对象也应涵盖信息处理、

定量分析、数据挖掘和提取和多模态表征方式。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七个场景着手:

(1)在元宇宙视野下,跨文化翻译共同体有必要设计出顶层方案,打造元宇宙数字翻译共同体。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近期出台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把数字化技术提高到国家战略发展高度。因此,翻译学科和传播行业有必要提升国际传播共同体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具备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综合素养和技能,将信息素养转化为数字素养,深化与新技术的交叉融合,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对外发展的需求。

(2)新文科建设方面,可通过元宇宙技术建构一个跨越时空、跨越语言的虚拟教学世界,并对它进行模仿、操纵和修正。有鉴于此,跨文化传播和翻译学科应加强学科的数字人文素养及虚拟仿真知识的储备,使之成为传播者及研究者必备素养;开展对数字青年教师的数字计算知识、语料库运用知识、数据收集与分析知识、数据储存与处理知识以及网络信息计量知识等技术培训等,也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积极拓展元宇宙、数字人文、虚拟仿真等技术设施的建设及其在翻译教学中的利用。在教学方面,着力推进传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教学数字化,构建教学的数字化体系,设置有关元宇宙、人文数字技术等方面的课程。对外传播领域有必要推进在线翻译平台、质量评估和检测、行业协同育人等数字板块建设,以数字化提升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探索数字化时代国际传播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形态。借助“元宇宙”之势,及时推出“虚拟对外传播教研室”平台,加大虚拟课堂的对外传播教学探索的力度。实现翻译教学资源共享;加强国际传播教学和译员训练过程中数据分析,以虚拟课堂提升学生的虚拟现实临场经验。在翻译教学中,打造“虚拟译员”,与学生译员互动,以替代口译教学中的 Mock Conference 的角色,使临场语境更加逼真。对外传播不仅要熟悉印刷文本,更要与时俱进地了解数字文本、图像文本及多媒体信息文本,并要掌握其编码和解码的方式,译介和传播的恰当手段,以及如何评价其接受效果。毫无疑问,翻译实践中的软件的运用,辅助翻译和自动翻译,翻译研究中文献采集、文献处理、数据分析、平行语料对比、融合媒体的使用等,皆离不开下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这一切似乎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

(3)跨文化翻译的历史重建与革新,与元宇宙思维产生了共振共鸣。“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20]在数字人文背景下,翻译研究应系统挖掘、整理、研究传统译论的内涵、特征及价值,重视对历代翻译家传记资料库的建设,收集翻译大家的手稿,将上述搜集到的内容数字化和可视化。具体而言,可通过元宇宙技术重现历代高僧大德翻译家、当代翻译大家视觉形象、仿真生活环境及翻译思想的重建。如唐玄奘西天取经途径 110 国,翻译佛经泽惠中土;道安不仅组织了大型翻译道场,而且在湖北襄阳 15 载培养了如净土宗创始人慧远等,如能用数字技术和虚拟仿真手段重建,不仅将平面化的纸质文档和照片映射至高维空间,突出记忆片段的层次和空间以及上下文语境,从多维度角度进行价值挖掘和显化,对其知识组织和可视化环境进行二度阐释,不仅使社会从“叙事场所”和“记忆宫殿”等角度,重识名家名译的文化贡献,生动呈现翻译历史的记忆实体和记忆图谱的演变规律,凸显对外传播的特殊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而且可使离散的翻译大家的形象及其贡献成为存史价值、情感价值乃至一种集体记忆,还可激励全社会为文化自信注入新的活力。

(4)实施经典名著的译作和数字化储存及传播工程。跨文化翻译是一种双语转换活动,双语或多语翻译典籍浩如烟海。应着手实施典籍译作产品的数字记忆的建构,长期存储和数字化传播再现,使之可解读、可保存、可传播、可关联,打造数字记忆译作资源库,使之达到在多元语境下达到可传播,可共享,并解决其中的确权和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一俟时机成熟,可打造 NFT 名家交易平台。同时,在多模态、多场景、多元文化背景下,创新大数据传播资源,为不同国别族裔成员提供动态多语种国际传播服务。

(5) 打造元宇宙、数字技术等国际传播新方式。在对外传播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新媒体、虚拟现实手段,注重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的立体逼真的功能,凝练对外话语交流和文明互鉴互赏的新模式,提升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以全方位、多模态方式打造对外传播的媒介平台,在跨文化传播、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开展元宇宙背景下跨文化翻译的伦理研究。在人机共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智能伦理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不二法门。除了关切机器赋能以人“超能力”之外,同时我们也应该审视机器作为行为主体的伦理问题。在去中心化背景下,作为传播者或译者的主体性是否会被解构?例如,2017年由香港汉生机器人公司制造的机器人索菲(Sophie)被沙特政府授予了公民身份,它打破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机器翻译人的诞生对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机遇和挑战。但如何使机器行为符合惯常的社会伦理道德?面对新问题、新局面,除了传统的传播伦理、翻译伦理研究之外,智能伦理的研究也成为全新的思考课题。由此可见,元宇宙作为一种技术范式,不仅跨越甚至颠覆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疆域,也可为知识创新提供新的命题。

(7) 建立元宇宙背景下跨文化翻译成果的评价体系。跨文化翻译产品的评价或传播成果的评价是一种价值评价,它既涉及客观的技术计算标准和操作方法的还原,又涉及主观解释的合理性。元宇宙背景下生产的翻译作品、传播作品的价值认定、分类和质量评价,应该得到跨文化翻译共同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也应该建立起相关的批评系统或评判规范制度。

可预见,元宇宙时代的翻译活动,围绕原文—作者与译者—读者的二元划分也随之遭到解构。数字时代的译者不只是被动的文本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目的语文本内容的参与者和消费者,更是传播信息意义的制造者和技术的互动者。在反身性的后现代性中,应重视人和机器的相互识解,即我们制造了工具,工具也制造了我们。按照德鲁兹、伽塔利以及拉图尔的后现代理论观点,人与其他技术要素交叉融合后构成了新的人机耦合翻译模式和新的认知集合,数字时代的编码和解码,组合和耦合,形成了多层代码的“文本层压”(textual laminate)。同理,翻译文本经过数字重组,文本化注释和数字提取后,也成为与译者共生的新媒介代码层。正如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具有创造性一样,作为构成元宇宙基础设施的语料库、语音识别、机器翻译与传播者一道,构成了具身交互技术,形成了身体与数字化身的映射关系,完成人与虚拟环境的具身互动,构成了新的人机耦合翻译模式和新的传播共生体。在未来的元宇宙世界,人类意识与生物意识的融合之后,文本符码在解码、编码、选择、迁移和转换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优化,人机交互进化。作为传播者的译者与智能共生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甚至在强大算力和算法的场景下,脑机接口和AI神经网络系统有可能形成超出人类译者智能形态,从而终结传统的人脑认知范式。

五、结语

当然,元宇宙的技术因素不可能也不应该宰制人文社会科学,解构跨文化传播和翻译学科,从而形成一个天马行空的网络乌托邦。盲目崇拜技术赋能来带的变革只会误入歧途。在探索阶段的元宇宙虽然有可能在某一阶段改变人们对传播对象、传播环境、翻译认知等方面的视域,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文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性质。虽然全球蜂巢思维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传播技术、翻译技术能极大地提高传播效率,增加临场感和即时感,同时,大数据和新媒体的运用使传播者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大,选择更具有多样性,然而,无边界信息流、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信息的碎片化传播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使人们感到越来越困惑。因此,技术应用与行业的适配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数字工具之间的互通性及可操作性还需要磨合。此外,国际传播实践中尚缺乏高质量的多语种数据库的开放应用,规模化的数字传播平台和译介平台亦有待建立。

质言之,我们必须从吉登斯的后现代的“经验封存”(sequestration of experience)来反思传播者作

为“自我”的个体在客观世界(Umwelt)与虚幻时空界之间的错位,进而认识元宇宙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元宇宙世界是按照人的观念和目的,而不是完全靠因果自然法则创建起来的结构。人的思维模式赋予了元宇宙世界以意义,意义的传播与迁移,离不开真实世界的制约。鉴于开源操作系统不同、数据库和编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跨文化偏见及价值观迥异,元宇宙世界从而一定会与现实世界产生冲突,进而制约了传播数据迁移、信息转换和翻译效果,从而形成媒介传译的不可通约性。

此外,人文与技术之间的磨合还需从人文主义角度予以阐释、反思和批判。由于数据集成和互操作性问题的存在,智能翻译和解释元数据组成的认知格式塔主体之间还存在不确定性。“随着数字工具的介入,数字人文主义试图理解当今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的特征是批判与反思,而不是赛博拉拉队员的路演。”^[17]不仅如此,在元宇宙翻译范式的迷思下,我们必须警惕“互为主体性”的诱惑。倘若跨文化翻译将数据自动转化为信息,将信息转化为传播知识,在转识成智之后,机器可以处理海量数据,且由于机器智能学习的效率很高,反过来要求人类不断生产数据,分享信息,人类最终可能“误入”万维网编织的信息劫网之中,从而超越了人类心智的理解和控制。

“元宇宙现象”带给跨文化翻译的启示,是否是“翻译的终结”呢?悲观主义者认为,未来的元宇宙的世界,翻译和传播最终由机器人来掌控,或者一旦翻译转换成元宇宙虚拟译员的身份,“翻译的终结”即成为现实。乐观主义的推论则主张,信息社会中人的所有的活动变成了信息符码的储存、交换、确权和身份转换,那么未来的元宇宙世界也就是翻译世界的“逍遥游”了。阿凡达(虚拟化身)的力量也就是翻译和信息传播的力量。“从这种意义来看,随之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所有变革即从属于符号的可转换性或翻译。”^[17]毋庸讳言,元宇宙时代带来的剧变浪潮正席卷整个世界。伴随这一前卫技术的涌入,译介不再是纯粹的纳克索斯的回声,因为机械的回声是无生命的回应,而是插上了翅膀的、能沟通虚拟与现实的信使赫尔墨斯,因而译者作为传播者的角色可能成为明日黄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基于数字驱动的语言传播和生产在未来十年将会迅猛提升,数字传播、数字翻译、开源链接、共创共享,将带来新的颠覆式革命。在可预见的岁月,一个具有全息生成的翻译和传播模式终将来临。

参考文献:

- [1] 李彬. 传播学引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209, 214, 2.
- [2] 葛荣晋. 中国哲学范畴通论.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79.
- [3] 孔德. 论实证精神. 黄建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2.
- [4] G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5.
- [5] 闻一多. 神话与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162.
- [6] 苏雪林. 《天问》九重天考//屈赋论丛.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321.
- [7] 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 元宇宙.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1: 35.
- [8] 朱嘉明. 为《元宇宙》作序//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 元宇宙.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1: 2, 3, 4.
- [9] 埃科.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王天清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171.
- [10] 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
- [11]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5.
- [12]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353.
- [13] 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 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719
- [14] Benjamin, Andrew. 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 New Theory of Words. London: Routledge, 1989: 63.

- [15]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205.
- [16] Chester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Ltd. , 1997: 7.
- [17] 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 3, 7.
- [18] Smithies, James.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Digital Moder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53.
- [19]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43-52.
- [20] 福柯. 知识考古学. 谢强, 马月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6.

Towards Metaverse Translation Paradigm: A Possible World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u Junp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era of Metaverse approache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a dramatic paradigm shift. The paper aims to conceptualize a fundamental idea of Metaverse Translation Paradigm (MTP) by drawing on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By quoting from the Positivist thinker Auguste Comte's 'laws of three phases' (theological, metaphysical, and scientific),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arliest developments of cross cultural and mythical canonical narrations of Metaverse as cosmological prototypes, so as to reveal the virtual reality of temporal and special implications of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TP, with a view to taking linguistic philosophy as its metaphys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structs, and proposing that the transferabil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while focusing on its interlinks with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also holds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TP, technologies such as digital humanities, virtual reality and AI etc. can find wide ranges of applications in scenarios specifically in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Finally, the paper reflects the ethical facto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Metaverse Translation; paradig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pistemology; transferability

■ 收稿日期: 2022-07-02

■ 作者单位: 刘军平,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刘金波